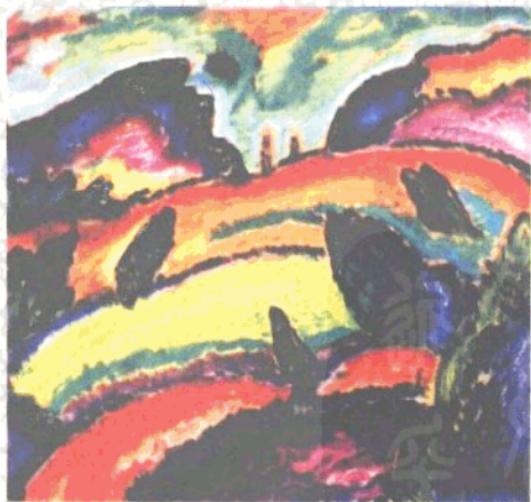


# 陕西名家

## 中篇小说精选(上卷)

CHOICE WORKS OF SHAANXI  
FAMOUS NOVELISTS

柳青 路遥  
贾平凹 陈忠实  
李小巴 赵熙  
王宝成 高建群  
程海



陕西旅游出版社  
SHAANXI TOURISM PUBLISHING HOUSE

## 序

陈忠实

到今年十月，即这一套书面世的时候，陕西省作家协会满四十岁。

按时下的生活新潮，四十周年该当大庆祝。然而我们这里的人，似乎对那种大张旗鼓大吹大响大轰大嗡的庆祝形式缺乏兴趣，便不想随那种厂庆校庆刊庆的热潮而逐流。但确实还是想庆祝一下，毕竟四十年了，很不容易的，于是就策划着用这一套书来作庆祝。

四十不惑。这是说人，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文人会聚的文学团体来说，何尝又不如是。四十年风雨坎坷，四十年大起大落，无论是对于某个单个作家，还是对于这个由作家文人聚集的社会团体，都会有诸多的不惑的警悟。

四十年里，陕西始终作为一个文学大省，两度辉煌，一度暗淡。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以其杰出的小说散文创作辉煌于新中国的文坛。新时期以来，陕西成长起来一支更庞大的中青年创作群体，他们的创作成果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读者的广泛兴趣。最暗淡的日子当属“文革”，从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到编辑和工作人员，全给一锨铲起抛到炼狱里去了。当然，这不单是陕西省作协的个别性灾难，所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然而，在阴霾荡除以后，那些以生命相托于文学的作家又重新集结，那

些把生命理想也寄托于文学的青年作者更加踊跃，真可谓十年悲歌十年生聚，再度辉煌，终于步入这个砸不烂更痴情的文学团体的不惑之年。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一代陕西作家在近几年间进入一种艺术创造的大释放状态，把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展示出来，造成了一个省的文学创作的鼎盛期。这种群体创作的大释放状态肯定还会持续下去，可以期待有大作品问世。

无论老一代作家和这一茬中青年作家，他们的全部创造性劳动成果，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陕西作家的作品带有普遍的地城特色，艺术上也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成为当代文学百花园里的西部之花。

这三种五本书里选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是四十年来最具成就也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发韧之作。把这三代作家的代表作汇册出版，无疑是可以看作陕西省作协四十年历程的一次回顾性展览，作为我们献给读者的一份礼物，自觉以为是对四十周年的最富诚意的纪念和庆祝。

1994年9月于陕西省作协

## 目 录

狠透铁	柳 青	( 1 )
蓝袍先生	陈忠实	( 58 )
天狗	贾平凹	( 165 )
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九六一年纪事）	路 遥	( 219 )
啊，故土	李小巴	( 289 )
放马天山	王观胜	( 404 )
雕像	高建群	( 463 )
赌徒	杨争光	( 514 )
车帮	杜光辉	( 567 )
五点钟	京 夫	( 619 )
睡着的南鱼儿	邹志安	( 648 )
川客	赵 熙	( 720 )
困窘的小号	晓 雷	( 790 )
宝物	莫 伸	( 841 )
黑龙沟的传说	王宝成	( 931 )
秘密	李天芳	( 974 )
长长的月亮	白 浩	( 1009 )
人之母	程 海	( 1085 )
天平	文 兰	( 1147 )
后记		( 1202 )



柳 青

Lǔ qīng

---

## 狠 透 铁

**【作者简介】**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县人。历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长安县委书记、陕西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集《地雷》；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散文集《皇甫村三年》（中青版）；小说《狠透铁》（此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初名《咬透铁锹》修改成名后，在陕西出版。《创业史》在《延河》1959年全文连载，再加工于上海《收获》第二次发表。建国初，曾访苏。

---

狼透铁越来越觉得他不能继续担任生产队长了。在合作化的几年里头，他的头发上落了一层霜，白了将近一半。他才 53 岁，还不到白头发的年纪啊。一贯没担过事的人嘛，一下子料理 50 来户人家的庄稼事务，再加上社员们复杂的思想状况，劳神劳得他颠三倒四，说东忘西，常常到处寻找手里拿的东西，惹得大伙好笑。唉！身体也不行了，风湿性腰腿疼大大限制着他的活动，整得他每天早晨拱着腰圈着腿走路，晴天直到半前晌才能逐渐恢复正常，阴雨天就更遭罪了。

他细想起来，实实难受。自己从 1949 年一解放在水渠村头一个和六十二军的地方工作队接头起，组织起农会，自己当着农会小组长，取消了农会实行普选，自己又当人民代表。人们不是说跟共产党走的话吗？不！从小熬长工一直熬到 1950 年土改的我们这位老队长说：“咱不能跟共产党走，咱要跟共产党跑。要愣跑愣跑！”的确，只要是党的号召，他使着狼透铁的劲儿响应；这股劲儿不是从肉体上使出来的，而是从心灵上使出来的。1954 年春天，水渠村以他为首成立起 11 户穷鬼的合作社，没有饲养室，借也借不来，盖又盖不起。牲口不能集中，会给管理上造成多少困难！全水渠村的上中农，都拿眼睛盯着，看狼透铁怎办；狼透铁拧住眉毛，使劲地想呀想呀，也想不出个办法。最后他忽然想起了，鄙视自己的愚笨，回到家里向老伴下命令：“搬！”老伴不明白搬什么。他说“搬家！”他把家搬到同一条巷子一个刚刚死去的孤老婆空出的破草房里，腾出他土改分的地主的高瓦房做了饲养室。以后他只要一回家蹲在那破草房脚地吃饭，老伴总咄呐得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后来的行为表

明，所谓搬家，只不过是把她和小儿子娘俩撵出去罢了，他自己则一直和饲养员一块挤在原来的小炕上，下炕就是新盖的牲口槽。而在收割的季节，提防失盗和防止不满咱政府的人破坏，老汉自己又睡在打粮食的场上用田禾秸子搭的临时窝棚里。那风湿症就是从那时在他不知不觉中侵入他的腰腿的。

老汉难受的是：自己吃了许多苦头，为的是合作化运动大发展，而当全水渠村高级合作化了的时候，自己却给人民办不好事情。他羡慕那些头脑灵动的人，羡慕拿起报纸念出声音的人，羡慕在大社开会的时候虽然困难却也低头在本本上写着什么的人。他恨自己脑筋迟钝，没有能耐。要是拿起铁锹和馒头，唾两唾手干起活来，水渠村没有一个小伙子比得过他；但是在会上讲话，眼白眨白眨盯着旁人如流水般滔滔不绝，轮到自己没话说。为什么？脑子里空空的，旁人说的记不住，自己要说啥想不起来。有一回，他召集起队委会，要传达大社管理委员会布置的几样事情，最后觉得还有一样，他却连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好用他那粗大的巴掌狠狠地咬着牙打击自己头发霜白的脑袋，愤恨地骂自己：“你呀！你！鬼子孙！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他说得那样凄婉、伤心，弄得大伙哭笑不得。

有几样事忘得简直使人寒心。春天，大社布置各队种洋芋。那次布置了好几样工作：关于进终南山背木料、关于养猪和防止猪瘟、关于牲畜配种、关于种菜老汉们的工分和关于种洋芋种籽的准备……等等。他就把种洋芋的事忘得光光。直到队里有人看见其他队整洋芋地，问他，他才想起这层事。副队长王以信明知道，也不提醒他。他从大社带回来“三包”合同，顺手放在屋墙上吊的一个放瓶瓶罐罐的木板上，听说老黄牛有病，就往饲养室跑。以后忙于别的数不清的许多事情，就忘得连家里交代了。副队长王以信和他一块从大社开会回来，也不记得

他向会计交代。直到夏收快到分配的时候，会计问到“三包”的底底，他才想起来了。他慌忙跑回家去一看，呀呀，幸亏纸片片被灰尘埋得几乎看不出来，要不然给老伴捞去剪了鞋样子，才糟糕呢。他一边打自己的脑袋一边走，回到有许多拿着杈、耙、木锨、扫帚的男女社员的打麦场上。

上中农副队长王以信高兴地笑着说：

“老队长，你甭打。脑筋越打越昏。……”

他听得出来王以信是讥笑他的意思。他早知道副队长总给他穿小鞋，故意看他的笑话，从来也没提醒过他一件事情。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脑筋不管用嘛，又怪不得人家。而且他心里明白：王以信面面光、嘴巴紧、不说闲言，心底并不喜欢这合作化。是被合作化的高潮推进来的人，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思想！老队长并不生副队长的气，他对所有他认为是必然的事都不生气。他只生自己的气，因为自己是党所依靠的人，理应给社员办好事情而办不好，真急得他抓心啊。

他经常担心他会把社员造成大损失，这样能把他的心急成粉碎。他是实心实意想给社员办好事啊。要是大伙把劲使在一块儿，他有信心把事情办好。可惜水渠村以王以信为首的上中农集团，总给他捣乱。他们给他起了各种外号——跑烂鞋、烂牛车、狠透铁——损害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你们爱说什么呢？我承认我狠透铁！你们骂我，就是称赞我哩！我得更加劲给社员办事。”他这样想。不过他不得不被逼一边使正心眼，一边使拐心眼，防止上中农集团使坏。这就使他的心和脑子更忙了。

## 二

终于发生了“红马事件”。

有一天，老队长在饲养室铡过草的地方扫院。啊呀，老队长！你扫院做啥？你扫院，却让那些挣工分铡草的年轻社员拍打了身上的灰尘，噙着烟锅回家去。你不会噙着烟锅在地上蹲一蹲，想一想队里的事情吗？不！不行！手里不做什么对他仿佛是一种处罚，他受不了。他已经习惯了一边做活一边思索，停住手，也就停住了思索。他扫着院子，一边想着如何调配第三生产组的劳力。

“老队长，”饲养员说，“先前富农的那匹红马不吃草，蛮退槽，许是病了。”

他丢下扫帚，进饲养室去看看。果然，红马两眼无神，脑袋扎地。

他赶紧拉到离水渠村三里的邻村去找兽医。

傍晚时光，他回来把红马拴在拴马桩上，对饲养员说：

“不要紧的。有火。兽医说一服药就行了。”

“谁去买药呢？”

“我去。吃过晌午饭就去。”

他回到家里吃晌午饭。老伴楞咄呐他，又咄呐得他抬不起头。说他既然“以社为家”，根本就不应该回家吃饭。又说他是睁眼瞎子，迟早要给队委会那几个中农装在口袋里卖了，等等，等等，咄呐得他心烦，好像有 72 个号筒同时对准他耳朵吹。

“人家叫你狠透铁，一点没叫错的。只要社不要家，忍住心不管俺娘俩。真正是，唉，家里不要家里，亲戚不要亲戚，咱算什么人家！我说：他大姐今日娃满月，你是去也不去？你听见了没？聋子！”

“我今日有事，改日我补去。”他说。这时他已经被老伴咄呐得脑筋错乱了，腰里装着红马的药方子，脑子里只知道“有事”，到底有啥事，开始模糊起来了。

老婆继续进攻：

“你今日有事！你哪日没事？”

他笑了。“话是实话，”他心里想，“农业社没有没事的时光。不管哪日，队里大小总能有点事儿。”但他留胡子的嘴里却凶：

“你吵吵做啥？愣吵愣吵！”

老婆不怕他。一点也不怕。她更加猛烈地进攻。

“你是去也不去？啊？说一句响话！你要不去，俺娘俩去啦。既去啦，就要在那里住它几天，看你上哪里吃饭！让你‘以社为家’去！狠透铁！”

他一想，不好！她娘俩走了，他回家冷锅冷灶，怎么行呢？

“算了算了！我去！看把你凶得那样吃人呀？”

他化了半晌的宝贵时间，走了20里路，到了窟窿村他大女儿家里。他一路难受，带着一种勉强的心情，恨他老伴的思想跟不上社会的前进，扯他的肘。在路上走着，在亲戚家喝水、吃饭和老亲家谈话，他都表现得心不在焉。他总是在难受，总觉得队里离不开他。他摆下人民的大事不管，却走亲戚，感到自惭。至于队里到底有什么事情，他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走的时候给队里的任何人没打个招呼。真该倒霉！

他急得很。日头快落的时候，他起身回家。我的天，他哪里还能在外头过夜呢？队里的马房、副业、各生产组白天的进度，在他的脑子里不是单独地、一样一样地出现，而是像搅成令人心烦的一团乱麻，堵在他脑门上。老实说，他不放心队委会那几个中农成员，他们是应付差事，并不把农业社当做事业搞。他为了私事离开水渠村，又在外头过夜，良心要责备他。他坚决要摸黑回家……

亲戚全家总动员挽留他。拉拉扯扯。

“黑夜没月儿……”

“叫全窟窿村的人笑话俺，说天黑了还让亲戚走了。”

“你是和俺有意见了吗？”

“啊呀呀！”老队长心烦地想：“这些人怎么会全是旧脑筋，没一点社会主义的思想儿！”

他的大女儿在没有公公、婆婆和女婿的场合下，偷声说：

“爸爸，你甭那么别扭。人家不高兴你，说你狠透铁。”

“算了算了，啊呀呀！”他住下来了。

夜里，他睡在亲家的炕上，晃晃悠悠。不知怎么样，交感神经一错乱，他从什么高处跌了下来，跌坏了腰腿。他被人们用门扇抬着。上哪里去呢？上县人民卫生院去吗？完了！完了！他这回算完了！能活着也参加不成农业社的活动了。亲爱的农业社呀！他是从三户的互助组搞起来的呀！他为农业社费尽了心思，饿肚子，熬眼，磨牙，嚼舌头。他怎么能离开农业社呢？

他被惊醒来了，浑身冷汗。啊呀，多么高兴呀，原来是梦。是梦！是梦！他还能在队里工作。万幸！万幸！他用被头揩了脸上的冷汗。

他在枕头上仰头看看窗户，还黑。他简直等不得天亮。什么时候天才亮呢。他急着要回水渠村。

鸡啼了。天亮了。他醒来穿衣裳。

从他的衣裳里掉下来一个纸片片。什么东西？好像那纸片是个动物一般，他猛一把抓住了它。

他的脑子麻木了。这是红马的药方子啊！我的天哪！

他没有等吃饭，连口冷水也没喝，赶紧往回跑。这回，主人说什么也留不住他了。什么风湿性腰腿疼！他路过张良镇买了药，继续跑。他跑得满头是汗，满身是汗。走几步歇歇气，再跑。

庄稼人吃饭的时光，他回到水渠村。饲养室大门外的土场

上围着一簇人。他听说：“老队长回来了。看，那不是老队长吗？”他心里捣鼓：一定出了什么事儿！

他跑到跟前伸长脖子一看，红马四个蹄子蹬展，死在地上了，上下嘴唇软囊囊地翻着，露出两排大板牙。人们告诉他：兽医没断清病，不光有火，是黄症，夜里死在槽底下。

老队长好像被一根肉眼看不见的棍子当头抡了一棒，栽倒地下。他呜呜咽咽地哭了，哭声凄惨。

就在这红马事件以后，狠透铁不能担任水渠村的生产队长了。副队长王以信升任了队长，第二生产组的组长、王以信的户族叔叔王学礼，也是个上中农，担任了副队长。社员们希望从此搞好生产，看来，他们似乎比狠透铁有管理庄稼事务的经验。

新的队委会分配狠透铁担任饲养员，他咬牙切齿不服从。他要担任大社监察委员，监督队委会。真正狠透铁！大社主任和支部书记支持他，社员们同意了。……

### 三

人家有各种特长，譬如会计划、会办事、会写字、会算盘、会讲话……等等。狠透铁缺少这种一个人可以为许多人服务的特长。他在给地主熬长工的时候，学会了操持农具，还有正直这一样品质。而这品质并不是一般人每时每刻都重视的，有时甚至因为正直更被一部分人深恶痛绝，好像结了不解之仇似的。王以信一伙子人就是这样。

1954年秋后，水渠村西头八户贫农和三户下中农成立起初级社以后，社主任狠透铁心下有个底底。他根据全县和全乡合作化的进度，计划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把水渠村中间和东头的

农户吸收完。他预备尽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其次再吸收比较进步的上中农。至于王以信那样的富裕中农，他预备到最后，譬如说五年以后，才考虑他入社的问题。狠透铁总觉得王以信成分虽是富裕中农，心地是富农的思想。这人说话做事都挺强，他一入社，一部分上中农，很可能以他为中心，扭成一颗圪垯，和主任为难。狠透铁认为：五年以后，他的管理能力锻炼起来了，他在水渠村群众中的威信也高了，党员也增多了，他就不怕哪一个富裕中农或者他们的集团捣乱了。但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出乎一切人的预计，当然也出乎狠透铁的预计了。一年以后，1955年秋天，平地一声雷，全水渠村除过地主、富农，一股脑儿涌进了11户的小小农业社。那是一种真正的群众浪潮，任何人拿任何理由也阻挡不住他们。到这时，原来11户的初级社的基础，比起七八十户的新社来，算得了什么呢？按照水渠村中间和东头的那些未经过很好教育的新社员的意思，要选王以信担任队长哩，狠透铁当副队长哩。因为乡上党支部委员会坚决反对这种违反阶级路线的做法，王以信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却可以在以后整个的巩固阶段，给正队长增加麻烦。唉唉！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人家活动的村中间和村东头部分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嘛！

狠透铁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觉得社员们对他还罢了。一旦离开了这个职位，水渠村的许多人对他似乎冷淡起来了，好像连他在初级合作化的那两年的奋斗，也是许多年以前的上一个时代的事了。他到饲养室、到豆腐坊，截然感觉到一种对他不那么热乎、不那么自然的气氛。监察委员和过去当队长的时候一样，拿起扫帚就扫院，蹲下就往豆腐锅底下填柴，但是人家和他没有什么话说了。王以信他们对群众说：前任队长是损害了人民利益的人。

“不怕低，单怕比”，低个子和高个子一比，才显出低来。新队长王以信比他脑筋灵动，会安排，打得开场子，相形之下，更显得他不行。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千方百计，竭力团结副校长王以信，想一块把水渠村办成先进生产队；但是他们中间始终隔一道鸿沟，他的一片火热的心总是碰到王以信的冰脸。为了联络感情，他曾到上中农副队长家里去串门。王以信的女人甚至刚刚和他打过冷淡的招呼，就指着孩子骂：“看你那松样子！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能成啥事，把人家害得哟！……”老汉的心同斧头剁碎了似地，走出副队长的院子。他心里想：“这是不满意合作化啊，这不是光骂我。傻婆娘呀，你不明白嘛，全中国都合作化了，水渠村就是没我老汉办初级社，一样要合作化哎。”那时候，他和副队长商量事情，得到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你看嘛，你是队长！”分配给副队长的工作，永远是应付差事。开会的时候，王以信总是躲在不显眼的地方，叫也叫不到领导人应站的中心地点：“你说嘛，你是队长！”事事处处，故意给他难堪。但是现在，王以信自己当了队长，几乎一下子变了另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奔波，饲养上、副业上、保管上，样样项项料理得井井有绪。只要有下爪处，总要做出一点比老队长管理的显然强的地方，给他难看。难看就难看吧！只要他们把队里的事情办好，正合监察委员的心思。他拿眼睛监察他们！

对他不满意的上中农社员，在村里散布一些很刻薄的话。

“让狼透铁折腾下去，咱水渠村都得喝西北风！”

“看他祖宗三代熬长工，哪来的本事领咱这大庄稼哩嘛！”

“他光会朝支部里黑告人，这是他的拿手戏！……”

富农乘机挑拨、煽风，假惺惺地叹气。

“唉！可怜我那大红马了，总也不出岔子，愣曳愣曳。想不到死到狼透铁手里！”

当村里谁都不提王以信的奸滑，贫雇农因为老队长的过失张不开口的时候，连地主也大胆起来了，公然咬文嚼字地嘲笑他从前的长工：

“坐井观天之人，焉能成大事！”

一股黑风笼罩了小小的水渠村，从1949年解放起一直奔波到高级合作化的共产党员，因为死了一匹红马，在村里没威信了。

“家有贤妻，丈夫不遭横事！”话虽这么说，为了走亲戚忘了红马有病的事，他可不曾抱怨过老伴。他想：娃他妈懂啥呢？给她盘费，叫她到北京去听上一回毛主席讲话，也不能把她的脑筋一下子改换过来。只怪自己脑筋不行了，做下对不起社员的事情了。但是现在，糊涂的老婆呀，她却对他气愤和抱怨起来了。

“好！好！这阵好！你真是背上儿媳妇逛华山，受了千辛万苦，也落不下好名。你再‘以社为家’去嘛！”

每一句话好像一把尖刀子，直向老汉心窝戳去。老汉红着脸，感觉到难受，感觉到惭愧。并不是因为老伴羞辱他，而是因为他羞辱了水渠村的贫雇农。

他粗大的手掌摸着小儿子的脑袋，沉痛地说：

“娃呀！你哥土改那年参军，为的是保咱人民的江山。你爸在村里当个生产队长当不好，毛主席在水渠村靠咱，这阵靠不住，让人家上中农作弄了。你在学堂里好好把书往肚里吞，日后好补爸的亏空……”说着，老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不管村里人说什么，老汉照旧出席队委会。他怕什么？他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忠实人手！不管王以信他们爱听不爱听，他照旧发表意见。遇到他觉得不公道的决定，譬如改变他从前的决定，抬高猪粪价格对中农有利，压低人粪价

格对贫农不利，他毫不客气地“监察”他们，要他们重新商议。王以信他们用很不高兴的眼睛盯他，他满不在乎。他想：“咱抱一个大公无私，心里没一点见不得人的东西，怕啥？”

渐渐地，他看出队委会有几个人有点烦他，好像他是队委会的累赘，怎样能摆脱他才好。

有一回的队委会，竟然没有通知他。他想：“这是试探咱，要是咱不声不响，以后开会就不再叫咱啰。”

他用笑脸向生产队长提出抗议。王以信支支吾吾承认疏忽。果然，以后再没有不通知他的时候。

但是有一天，他脸上盖着一层尘土从地里刚回家，老伴就咄咄呐呐：

“你真正狠透铁！你不管人家队里的事情，就过不了日子吗？”

“人家队里？谁家队里？”

“王以信他们嘛……”

“哼，你尽胡说白道！”老监察瞪着眼说，“王以信他们根本是面上应付哩，心里恨死了合作化。人家队里！我不管，不知他们会搞什么鬼！”

“你管！你管！叫人家说得你好听！”

“他们说什么呢？我一步一个脚印，不做坏事情。”

“人家说你是‘搜事委员’，老傻瓜！”

老监察不禁一怔。怪不得他近来觉得许多人对他更冷淡了，在上地的路上走着和在地里干活，都有点不愿和他说话。他一打听水渠村另一个党员吴有银和一个团员王以鸾，才知道底细。吴有银说：“搜事委员”的名词最先是从王以信口里出来的，由对监察委员有成见的几个人的嘴巴广为播传，才弄得家喻户晓了。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一般人不参加队委会，每日从家里

到地里，又从地里到家里，除过对自己的工分特别关心以外，也不去细究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他们听说老监察是“搜事委员”，大约就是那样吧，因为照一般人的分析，以为前任队长可能对新队长有些报复思想。……这样从人情上一分析，人们就更加鄙弃他，认为他自己办不好事，就不该眼红别人。这使他在村里更没威信了。

老监察很重视这个发展。这是有意破坏他的威信，在群众中孤立他哩。后半晌他没上地去，提了烟锅到大社去找主任，要求解决六队（水渠村）的不团结问题。

忙忙碌碌的社主任正在给各队分配第二批化学肥料，没工夫细听他的谈叙。而且，王以信上任以后六队的工作局面，显然使社主任忘记了王以信担任副队长的时候不协助正队长的那一段事实。社主任急急忙忙说：

“好同志哩，咱一个共产党员，何必和一个非党人士纠缠不清呢？有了问题，应当先从自己方面检查，疙瘩就好解，自己没故意搜事，叫他们说去！不怕说坏，单怕做坏。何必弄到队委会上，大伙眼瞪眼地辩嘴，越弄越不团结！年纪大了，省点气算了。我忙着哩，你和咱支书细谈去。实在对不起，老哥！”

他又去找支部书记。支书很同情他，说：

“你是不是有些神经作用呢？同志，眼下社员们看见王以信把六队的工作搞前去了，自己应该肚量大点，甭弄得自己在前头走，人家在后头指啊。红马的事情，社员们还没忘记。当然，王以信他们夸大事实，乘机打击你哩。可是咱本身的确有缺点，眼时怎能和群众说清楚呢？只好忍住点，看看情况的发展。同时，让红马的事情在群众脑子里淡了，冷静下来，咱再想法子恢复你的威信。再说，监察工作就是在是非里头钻哩，免不了闲言的。他说他的，你做你的。党支部了解你、信任你，你慌